

# 協助受創傷女性復原的新潮流—— 著重宗教與靈性的社會工作實務

劉珠利

## 一、背景：創傷案主的增加

所謂「創傷」(trauma)意指會造成身體或是情緒上損傷的傷害；在一般醫學的領域中，身體上嚴重的傷口謂之創傷，在精神醫學的領域中，情緒上的痛苦、壓力或是驚嚇的經驗，導致在身體上或是精神上造成嚴重後果的經驗，謂之創傷 (Medical Dictionary of MedicineNet, 2006)。在助人專業的社會心理領域中，對創傷的定義大都以精神醫學領域的定義為主。根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美國國家衛生院) (1995) 的分類，創傷的來源包括：天災 (natural disaster)、重大意外事件 (serious accident)、遭受強暴 (rape)、遭受俘虜 (being held captive)、遭受性或身體虐待 (sexual or physical abuse)、被綁

架 (kidnapping) 或是戰爭 (combat exposure)。如果以上述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創傷來源作為標準，對照行政院主計處 (2005) 出版的中華民國統計年鑑中社會保障及福利的分類，以及台北市社會局所提供服務的分類，在台灣，造成創傷的來源，大略以天災、遭受強暴以及遭受性或身體虐待為主。

近年來，台灣社會快速變遷，導致家庭快速解組，家庭暴力問題已經成為國家公權力必須介入的問題，不再屬於私領域的問題，因此家庭暴力問題成為各縣市政府必須介入的議題，也必須對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受害者、甚至目睹的兒童提供相關的服務。對於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受害者、目睹兒童而言，他們的遭遇都是一個創傷的經驗。

除了家庭暴力問題之外，性侵害、天然災害（地震、水災）等的受害者，也是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經常處理的個案。天然災害的受害者，面對一夕之間失去家人、失去財產、失去健康等的創傷經驗，短時間的災害，卻可能讓受害者沈溺於長時間的創傷經驗之中。在悲劇發生之後，如何能夠從創傷中復原，不但是個案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是一個專業人員必須提供的主要服務。

創傷復原的歷程，是大部分第一線從事直接服務的社會工作人員所要接觸的問題。在台灣社會問題種類快速變遷之下，社會工作的教育必須適度的反映社會的變遷，並且依照需要，調整課程的內容。然而目前台灣的專業教育之中，對於創傷議題的討論仍屬不足，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因此，研究者在這幾年接觸處理相關議題的社會工作人員時，經常發現許多第一線的社會工作人員，在處理創傷個案的復原過程，每每產生無力感。再者，創傷的復原歷程（trauma recovery process）是一個複雜、且牽涉許多面向的議題（Hesse, 2002），因此創傷的復原過程相當耗費時間以及精神，無法從創傷經驗中復原，不

但使得受傷的靈魂繼續受苦，更會加重社會的負擔。所以，創傷議題的認識與教育，是台灣目前極為需要的。

台灣對於創傷議題的了解與討論集中於創傷後壓力症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的症狀、產生的原因及處理的方法（王維芳，2000；沈勝昂，2001；林耀盛，2001；林耀盛、陳淑惠、洪福建、曾旭民，2005；范國勇，2000；陳宇嘉、王琇蘭，2001；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2000；黃慧菁、劉雪娥，2000；蘇秀娟、李慧貞、林建志，2000），這些論文提供了讀者有關西方文獻中，對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認識與辨識的指標與處理的原則，換句話說，提供了讀者對於 PTSD 的廣泛認識。另外一些論文則是對於創傷復健（rehabilitation）或是復原力（resilience）的討論（李俊源，2000；吳麗琴，2003；洪福源，2005；高淑貞 邱英南，2002；曾文志，2005；廖秀敏，2002；蔡素妙，2003；蔡素妙，2004；謝儒賢，2002）。雖然論文的篇數不少，但是論點幾乎相同，多數仍舊停留在 PTSD 的了解。當台灣社工界對於創傷與災變案主的處理需求

愈來愈多的時候，對於創傷處理模式應該更多元才能符合不同案主的需求。因此台灣目前仍舊需要對於創傷處理有更多的知識與了解。

近年來，在美國經歷數次颶風（hurricane）的侵襲以及紐約世貿大樓的慘劇之後，對於災害的研究以及災害／災變社會工作有頗多的文獻發表，研究者回顧這些文獻時發現，有一個新的角度出現，就是以 spirituality（研究者將之翻譯為「靈性」）做為協助案主從創傷中復原的方法。Weaver, Flannelly, Garbarino, Figley, and Flannelly (2003) 回顧了西方在創傷領域中權威的期刊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在西元 1990~1999 年間出版的論文，發現共有 4.7% 的論文和「靈性」(spirituality) 有關，顯示這個主題已經加入創傷復原的領域之中。

為何靈性的角度會加入創傷的處遇過程中呢？西方在創傷處遇領域中，重視靈性角度的興起和女性主義 (feminism) 以及重視多元文化 (diversity) 的興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強調必需重視不同種族、性別、社會階層等的影響，因此許多學者開始研究北美洲的原住民以及非洲裔婦女，發現協助她們的方法通常

必需將她們的文化納入助人過程當中，意即，將靈性 (spirituality) 的層面加入協助的過程才會產生效果。所謂文化 (culture) 意指一組價值、信念、或是規範，可以主導人們生活的樣貌，每一個文化都有特別重視的價值，非洲裔文化 (Afrocentric paradigm) 就特別強調靈性的層面。有學者認為靈性的定義是指，宗教信仰，或者是生活的意義 (meaning making)。在非洲裔文化的定義中，所謂「靈性」(spirituality) 意指宇宙當中看不見的物質，而這個物質可以將人們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將人們與偉大的神連結在一起 (Schiele, 1996)。靈性是一種超越個人存在、能夠連結宇宙並穿越日常生活事物的力量，宗教活動就是靈性活動的型式之一 (註 1) (Connor, Davidson, & Lee, 2003)。人類是靈性的動物，釋放靈性的能量才能促使人類相互溝通。重視靈性的文化認為，由於人類過度重視物質而忽略靈性的需要，所以才會產生暴力、物質濫用等的不恰當創傷適應 (coping) 問題。而療癒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將靈性與人類其他部分一樣重視，使得人類成爲一個完整的個人。由於尊重不同文化的療癒方法的興

起，使得北美洲原住民以及非洲裔文化中重視「靈性」的療癒方法，變成創傷復原重視的方法之一，這就解釋為何協助北美洲的非洲裔或是原住民的婦女時，必需加以靈性的角度，因為這樣的協助方法，是和她們相信的治療／療癒是一致的。

研究者在從事一篇天然災害受害女性的經驗的研究中發現，研究中的受訪女性所遭遇的創傷種類與程度不盡相同，有些受訪者失去家人，有些人失去健康與工作，有些人失去部分財產，有些人心靈受到創傷；在創傷復原過程中，有些人感謝縣市政府社會局社工員的幫助，但是有些人則非常感謝宗教以及宗教人員（包括基督教與佛教）的協助，認為是宗教救贖了她們，當然其中有人也是同時接受社工員與宗教人員的協助（劉珠利，2006）。在進行這個研究的資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不斷的思考，這兩種協助的方法，既然都可以幫助遭遇到創傷經驗的案主，這兩種協助的方法有何異同？兩者可否形成合作的關係／方法？研究者的這個想法和前述西方在創傷復原／療癒的新取向不謀而合，因此引發了研究者探討靈性／宗教取向

在創傷復原上的角色。本文以：在台灣宗教與社會工作能否合作？如何合作？作為本文所欲回答的問題，期待能給社會工作在處遇女性受創傷經驗案主，提供實務上的建議。

## 二、創傷的認識

### 1.創傷與復原

創傷（trauma）是人類經驗中，極具破壞性的經驗。創傷產生的原因極多，凡經歷天然災害、人為災害、遭受虐待、遭受性侵害、遭受暴力等事件，都是產生創傷經驗的原因。Alcock（2003）認為創傷經驗會危害到人類對於生存的意義（sense of being），同時創傷經驗也會使得人類用來應付日常生活的挑戰、以及處理恐懼害怕等情緒的防衛機轉產生瓦解，並且創傷經驗也會危及人類的認同（identity）。Hesse（2002）則舉出，創傷的經驗對於 7 個人類的認知基模（Schema）影響特別的大，受影響的基模分別是：(1)自己的認同、世界觀、以及心靈層次；(2)信任；(3)安全；(4)權力與控制；(5)獨立；(6)價值感；(7)親密。換言之，人類在遭遇創傷經驗之後，以上 7 個層面特別容易被創傷經驗所改變，使得

社會功能失去作用，產生生活上的困難。人類在遭受創傷之後，常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其具體的症狀包括：悲傷、害怕的情緒反應，麻木，自我譴責，失去記憶，對於事件重要段落產生遺忘，無法集中注意力等（Regehr, Marziali, & Jansen, 1999）。這些症狀的產生，就會使得生活失去秩序，社會功能降低，甚至產生精神方面的問題。

在產生創傷之後，人類並不是全然的只會被創傷事件擊敗，一些研究結果都顯示，人類可以從創傷中逐漸復原。所謂創傷的復原（Trauma Recovery）意指處理創傷事件的過程（Alcock, 2003）。Harvey（1996）認為，創傷復原是一個多面向的現象，所謂復原的標準包括：能夠記起過去強迫遺忘的事件、能夠回憶起過去與情緒、能夠喚起情緒但是不會被情緒所淹沒、能夠預測與控制症狀、能夠修復自尊、能夠修復人際關係的能力、以及能夠賦予創傷事件新的意義。根據他們的看法，在上述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被界定為復原，端看研究者或是實務工作者的界定，這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人類本身具有修復能力，人類具有的復原力（Resilience）可以從創傷中逐漸復原，換句話說，復原力能夠促使一個受創傷的人，逐漸回憶起情緒而不會被情緒淹沒，或者是能夠賦予創傷事件新的意義。復原力是一種能力，能夠讓一個人在面對嚴酷的考驗時，能夠彈性的回復應有的功能，也就是說，能夠幫助一個人在創傷的經驗中存活，不再受困於負面經驗的能力（Garmezy, 1993; Turner, 2001）。這種能力是存在個人內在而且是可以被開發的（Mills, 1995）。而人類本身具有優勢（Strengths），這些優勢可以轉變成人類的復原力，是決定創傷復原歷程的重要因素。舉例來說，Turner（2001）認為具有幽默感、具有方向感或是使命感、具有洞察力、具有自我效能、具有技巧、能夠獨立的人，這樣特質的人在面臨創傷經驗時，較能從創傷中復原，所以具備前述特質的人，可以稱之為具有復原力的人。為何這些特質能夠幫助一個人從創傷中復原呢？Turner（2001）認為，幽默感能夠使人減低壓力，使命感能夠使人從負責任的過程中找到意義與能力，洞察力與技巧能夠使人對於自己與他人有正確的認識，獨立的能

力讓人可以從他處獲得正向的學習機會而不會攪和於問題當中，自我效能讓人相信自己可以掌控命運而不會被命運掌控。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能力是否能夠成爲復原力，必須和其他因素合併來看，也就是能力能否轉換成爲復原力，和個人主觀上對於壓力的看法、個人資源的多寡、以及個人過去成功或是失敗的經驗有關（Bartelt, 1994）。

具有良好人際關係的技巧也是從創傷中復原的因素之一，因此建立良好的關係的能力，也是人類的復原力之一。建立良好的關係的能力讓人能夠不再將自己限制於不好的關係當中，且能夠選擇健康的關係（Turner, 2001）。經歷創傷的女性案主，如果本身在過去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技巧，並且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本身對自己有正向的自我概念，家庭對她有良好的支持等，在這些優勢條件之下，女性案主的創傷復原歷程就會快速許多（Regehr, Marziali, & Jansen, 1999）。Smith and Kelly（2001）的研究指出，遭受性侵害的女性的復原歷程，是一個由外逐漸往內的過程，在復原的過程中，受害女性會先逐漸能夠和他人恢復來往，然後再進一步的重新賦

予受害經驗一個新的意義，最後才能夠深入的重新找到自己，成爲一個重新整合的生命。因此，能夠建立良好的關係，將是復原的重要因素。這個部分對於女性案主而言，特別的重要。

基於研究對於創傷經驗與復原過程的了解，助人專業者在提供服務時，除了提供實質的幫助、轉介需要的資源之外，也需要提供情緒上的支持，創傷意義的探索，以及激發復原力。

## 2. 女性受創傷案主的情況

許多研究已經證實不同性別的人所面臨的創傷事件或是生活事件會有不同；不同性別的人對於創傷的反應與感受也都不同（Arrington & Wilson, 2000; Nan Van Den Bergh, 1998; Norman & Wheeler, 1996）。女性所面臨的性侵害等創傷，是男性較少面臨的；而女性社會化的過程，對於創傷的反應與應對的資源，也和男性不同。因此，對於創傷復原的研究，加入性別角色的角度是必要的。相較於男性，女性在社會上仍然位居脆弱（vulnerable）的地位，因此比較容易遭遇到創傷經驗。根據調查顯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患者以女性居多（Norris,

Perillam, Ibanes, & Murphy, 2005；葉美玉，2002）。女性的創傷經驗與反應為何創傷的領域之中，必須重視性別的差異？原因有下面幾項：原因一是女性所面臨的創傷經驗種類與男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女性遭遇性侵害與家庭暴力的經驗，不但數量比男性多很多，經驗也不一樣；而這一類的經驗會嚴重的損傷女性在日後和人的關係、人際交往的功能（Cloitre, Scarvalone, & Difede, 2006; Liem, O'Tool, James, 2006）；原因二是女性復原的資源不同，Bartelt（1994）以及 Regehr 等人（1999）的研究認為，人類的優勢、弱點、與所具有的資源，決定了復原的情況。男女性別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已經被決定具備不同的資源與權力，所以女性產生 PTSD 的機會與症狀比男性要多。原因三是因為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和男性不同，復原過程中所需要的協助方法不同。所以創傷復原的歷程與性別角色息息相關。

當社會仍舊是處於父權為主的架構之中，男性掌握了多數的資源與權力，而且不願意和女性分享時，就造成了性別間的不平等；當女性能夠得到或是運用的資源不多，例如：受教育的機會與資源有

限，就形成女性獨立生活或是面對問題的障礙，進而建構了女性的弱勢與脆弱。女性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中，已經內化了自己是低於男性的位置的訊息，學會了自我貶低，學會在權威人物之前保持沈默（Belenky et al., 1986/1997），因此形成了自我譴責的習慣。當創傷經驗發生時，女性就習慣以自我譴責的方式，面對創傷，使得創傷的復原過程變得十分艱辛，甚至於無法復原。因為女性習慣以自我譴責的方式，面對創傷，一些研究也都指出，在遭遇創傷事件之後，女性比男性有較高的比例出現憂鬱症狀以及出現較多 PTSD 的症狀（Kessler, Sonnega, Hughes, & Nelson, 1995; Norris, Perilla, Ibanez, Murphy, 2005; Raveis, Siegel, & Karus, 1999; Stoppelbein & Greening, 2000; Worden, 1996；葉美玉，2002），原因就在於女性習慣以自我譴責的方式面對創傷，不斷的內化自我譴責的訊息所造成的。同時，在女性社會化的過程中所內化的女性角色信念，也會影響女性在受暴後，對於受暴事件的解釋，例如：我不是好女人，所以別人才會如此對待我（Lebowitz & Roth, 2006），這也是 PTSD 產生的另外一個原因。

東西方的研究也都不約而同的指出，不同性別的創傷者復原力量的來源非常不同，研究結果都呈現出男性從外在的、客觀的事情中獲得復原的力量，而女性則從人際關係中的支持來獲得力量（Hope & Hodge, 2006；林秋燕；2004）。當男女性都表現出創傷反應時，男性比女性得到比較多的支持與資源，因為周圍的人並不預期男性的創傷反應，所以反而因此而得到比較多的支持（Hope & Hodge, 2006）。

這樣的結果顯示的就是，男女兩性因為社會化的歷程不同，所以對於創傷事件的解釋、反應、甚至復原力量的來源與資源，都有差異存在。因此男女兩性在復原的歷程中，會因為性別的因素，而有不同的過程。由於女性較為弱勢，而且女性所遭遇到的創傷經驗種類，也有其獨特性，例如：家庭暴力、性侵害的傷害，女性受害者的比例遠大於男性，因此在創傷復原歷程中，不能夠忽略性別的因素。

### 3.協助受創傷案主需要多重的角度

社會工作和其它專業之間建立協同合作的關係（collaboration），發揮更大的助人效果，已經是一個趨勢，過去在學校、醫院、以及精

神醫學領域當中，社會工作和其他專業已經開啓了協同合作的模式（Bronstein, 2003）。而社會工作和宗教的結合不但是最初社會工作發展的源頭，在整個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上，社會工作不曾間斷的以不同的型式和宗教結合。Canda（2002）指出，在 20 世紀初期，在天主教與猶太教的信念影響下，開始慈善事業與社會服務；在西元 1920 年至 1970 年代，由於社會工作強調邁向專業化，因此極力想要擺脫宗教的色彩，然而就在不同助人理論發展過程中，一些理論也和宗教脫離不了關係，存在主義的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西元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社會工作不再以白種人的想法為主流思考、尊重其它文化與宗教的思潮出現之後，宗教又變成社會工作的主流之一；西元 1996 年美國還更通過立法，使得宗教與社會工作的合作有了法源根據，西元 2001 年布希政府更啓動了信仰基礎的社會服務模式（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 initiatives）。許多受創傷的案主都會問：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後都只能靠宗教以及哲學方面來回答（Figley, 1989）。許多研究者都開始認真思考與建議，創傷或是受



苦最終是一個哲學／宗教的問題，所以這一類型的問題更適合採取助人專業與宗教合作的協助方式（Kennedy, Davis, & Taylor, 2000; Walsh, 2003; Yip, 2005）。以下的篇幅將討論這樣的協同合作模式。

### 三、文化與宗教在創傷事件中的角色——因應策略、意義建構、社會支持

#### 1. 文化與宗教（註 2）對於創傷的發生提供解釋

創傷的反應與因應策略，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對於遭遇創傷事件的解釋與復原過程，文化與宗教同時扮演重要的角色。Taylor（2003）指出，人類遭遇創傷後情緒反應的表達方式，受到文化的規範很多。而且人類在創傷的復原階段，會開始探索創傷事件對於人類生命或是人生的意義為何，在這樣找尋意義與解釋的過程中，文化或是宗教信仰就會對意義找尋產生影響。早年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都對於災難的發生，有一套神祕的解釋，時至今日，這些解釋在科學發達的時代，仍舊有相當的影響力。Taylor（1999）以在紐西蘭 Cook Island 的社區為研究對象，就發現當天然災

害發生之後的重建階段，當地非常有影響力的教會長老，認為天然災害會發生，是上帝憤怒的結果，因為當地的人有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所犯的罪。因此重建的過程中，有一個很大的儀式，就是居民必須懺悔，並承認過去所沒有承認的罪過。Taylor（1999）認為這樣的宗教儀式非但沒有幫助當地居民，反而是加重某些居民的自我譴責，使得這些人永遠生活於自責當中。然而一廂情願的跟居民解釋，他們過去所深信不疑的災難發生的原因是不對的，也是無法達到效果。因此，Taylor（1999）相信，在災難或是創傷復原的過程中，如果不加入文化的因素，是無法達成協助的效果。

王增勇（2005）對於台灣原住民婦女受暴與復原的研究中指出，原住民對於婦女受暴的歸因，並不單就這位女性受到丈夫毆打，所以就認定她是受害者，原住民還考慮包括這位婦女過往是否對老人的尊重、是否對於公共事務熱心等，綜合評估後才會認定這位婦女是否為一位受害者。如果被認定是受害者，才會得到族人的幫助。因為原住民對於受害者的認定自有一套屬於原住民文化的標準，這樣的結果也再次的呈現出，文化對於創傷、

受害有其獨特的解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或是宗教對於創傷經驗的解釋是多角度、正負面兼具。

## 2.文化與宗教對於創傷的發生提供因應策略、意義建構與社會支持

許多遭遇創傷經驗的案主，將宗教的信念當成是她們的適應方式（*coping mechanism*），而且有都認為這樣的適應方式是有效的（*Mattis, 2002; Neil & Kahn, 1999; Specht, King, Willoughby, Brown, & Smith, 2005*）。*Mattis*（2002）及 *Specht* 等人（2005）的研究明確的指出宗教如何讓她們發展出適應方法：宗教信仰在協助她們渡過人生苦難的經驗是全然正面的影響，宗教的信念讓她們找到生命的意義、找到行為的準則、也從宗教的教條中領悟出困難的意義、並且宗教幫助她們從苦難中成長、宗教讓她們最後將自己交給上帝因此得以心平氣和的面對自己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Faver*（2004），*Neil and Kahn*（1999）及 *Mattis*（2002）的研究發現還指出，除了宗教的信念讓受創傷女性及其照顧者發展出適應方式之外，因為宗教使得這一群婦女能夠和其它人，甚至是上帝建立起人際關係，在這種人際關係的支持之下，才使得宗

教的信念產生意義。如果從關係理論（*relational theory*）對女性特質的看法角度而言，這樣的人際關係似乎才是女性從苦難中找到克服之道的�方法。

但是文化／宗教對於創傷復原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Giesbrecht and Sevick*（2000）的研究指出，在西方保守的天主教教區中，宗教的信念是教區居民生活的重心，同時也是他們認同（*identity*）建立的來源。宗教對受虐的女性教徒有負面的影響但是也有正面的幫助。宗教強調家庭的價值，對於夫妻之間的角色分配、相處模式等，自有一套標準，通常這些標準都是屬於父權主義、刻板性別角色（*patriarchal family structure with stereotypical gender roles*）的想法。舉例來說，保守的天主教信念強調妻子應該是盡責且順從她的丈夫。但是保守的天主教對於家庭暴力／虐待的產生，也自有一套解釋，常見的解釋就是信奉者對於上帝的快樂家庭計畫，產生混亂的信念（*spiritual confusion*）所造成的；宗教上也以靈性的層面（*spiritualization*）來解釋受虐的理由，以便維繫宗教信念系統的可信，例如：宗教人員會告訴受虐婦女只要努力禱告，受虐的情況

會得以改善。這樣的宗教信念，加重了受虐的情境，造成遭受家庭暴力或是虐待的女性，在是否要離開受虐關係的決定上與後續生活的重建上，產生很大的困難與衝突；宗教的信念同時也左右著女性教徒在遭遇到家庭暴力問題時的情緒，有時候讓她們覺得羞愧或是罪惡，有時候也讓她們得到頓悟與希望，進而促成改變。除了天主教之外，Bradley, Schwartz, and Kaslow (2005) 對於社會經濟階層較低的非洲婦女的研究中，同樣也發現宗教的正面與負面影響。因此，文化或是宗教的正負面影響，是跨文化與宗教的，不是任何一個文化或是宗教的獨特性。

有意思的是，Connor, Davidson, and Lee (2003) 的研究發現，受到暴力對待的受害者（男女皆有），有愈強烈宗教信仰者，反而在受創傷後產生較差的健康狀況與較高的壓力感受。Connor, Davidson and Lee (2003) 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提醒我們，宗教信仰可能不是避免產生 PTSD 的保護因子，宗教信仰可能是受害者產生 PTSD 之後才採取的調適方式。宗教信仰對某些人來說，是適應負面生活事件的方式，而對某些人而言，是在遭遇創傷生活事件之後，才開始接觸宗

教。因此，宗教信仰在創傷復原歷程中才扮演重要角色，而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夠避免創傷的傷害。然而 Haight (1998) 的研究則指出，非洲族裔的人將宗教信仰當成是孩子社會化的一部分，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宗教的信念不斷的灌輸給孩子們，在這種情況之下，宗教信仰就有可能成爲一種減低創傷傷害的保護因子，因爲長期受宗教信仰薰陶的受害者，在創傷發生之後，能夠立即從宗教中得到支持與找到意義。當然，Haight (1998) 同時也肯定宗教信仰在創傷發生後，提供了信仰者一個很好的適應方式。依據上述兩個研究結果發現，宗教信仰是否是一個減低創傷的保護因子，需要更多的研究與討論才能得到結論。但是宗教信仰在創傷已經產生之後的復原歷程中是一個重要的復原因子，則是相當肯定的結論。

### 3. 宗教／文化的儀式，與助人專業結合，會產生良好的效果

雖然文化／宗教的獨特解釋，對於創傷的復原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但是適當的將宗教／文化的儀式，與助人專業結合，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是許多研究者共同推薦的

建議。以下就是這些建議學者的觀點。宗教的人員與主內的兄弟姐妹所提供的支持、靈性方面的鼓勵以及生活上實質的幫助，對受虐的女性教徒而言，都是正面的幫助。Kennedy, Davis, and Taylor (2000) 以及 Walsh (2003) 指出，許多受創傷的個人或是家庭，在他們最受苦的階段，都會從他們的文化傳統或是宗教信仰中，找尋安慰，因為人們最後都認為受苦 (suffering) 終究就是一個宗教信仰或是靈性方面的議題，而且在臨床上甚至都可看到這方面的信念使得案主從危機中復原的例子。Kennedy, Davis, and Taylor (2000) 的實證研究更明確指出，遭遇性侵害並接受宗教撫慰的受害者，多數自覺身心有復原的感覺，而遭遇性侵害但未接受宗教撫慰的受害者則多數自覺仍舊處在憂鬱的情況之中。足見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的結合，具有修補人類心靈的功能。因此，Giesbrecht and Sevick (2000) 建議，社福機構和宗教團體之間，應該形成合作 (collaboration) 的關係，共同幫助受虐／受暴婦女，尤其是有深厚宗教信仰的婦女；實際的作法上則可以善用她們的信仰，進而從信仰中催化出希望、頓悟與個人成長。

Hill (1997), Eagle (1998) 以及 Manning, Cornelius, and Okundaye (2004) 也都同意文化是創傷復原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他們認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次文化中，對於上帝的信仰 (believe in God) 與對群體的責任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是文化中重要的基礎，非洲裔美國人在經歷重大創傷經驗時，就以這樣的信念與方法幫助自己渡過難關。舉例來說，非洲裔美國人在經歷重大創傷經驗時，以不斷的告訴自己只要向上帝禱告，就會化解困難，只要愈相信上帝，就會得到愈多上帝的幫助；對群體的責任感讓他們相信必須要幫助在困境與創傷中的其他族人。因此社會工作人員如何善用這樣的信念，激發非洲裔美國族群背景的受創傷案主對未來的希望，是幫助他們的起點，也是一種跨文化的社會工作模式。

創傷這個名詞是一個從西方的 trauma 這個字所翻譯而成的，在華人的文化當中，大家慣用的是“受苦”、“苦難” (suffering, hardships) 這個用語。華人的文化中，在面對苦難時，大部分的人都會回歸中華文化中對苦難的解釋及適應方法，從當中找尋慰藉與開脫。Yip (2005) 認為老莊思想對苦難的哲

學，深深的影響華人對創傷的適應方法。舉例來說，老莊思想認為很多對立的事情都是一體的兩面，無力其實是有力，好其實也是壞，在老莊哲學中強調面對挑戰與變動時，抱持自我超越的態度，就能夠獲得平靜的心靈面對困難；保持靜默、以不變應萬變，反而是順應自然情勢與自然法則、釋放個人潛能的最佳方法；以不變應萬變並非消極的作法，反而是對自然法則的頓悟，讓心靈潛能或是行為自然產生的方法；人類應該追求無限的超越，超越世俗的、凡夫俗子的標準，超越生死或是人類軀體的限制。這些哲學態度和西方所認為在創傷中，應該採取積極作為克服創痛的想法與作法是截然不同。在這樣的思維底下，華人對苦難採取忍受而不積極採取行動的態度，甚至於認為這是最佳的策略，也就不難了解。雖然 Yip (2005) 承認他的觀點並不能夠適用於所有全球的華人，但是至少他解釋了部分華人文化對於苦難的解釋與應對之道。甚至於 Yip (2005) 還認為西方目前逐漸發展出的重視靈性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應該將老莊思想納入其中。Yip (2005) 的觀點倒是對靈性

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提出了另外一個跨文化的考量。

宗教的儀式，也提供了撫慰的功能。Eagle (1998) 以南非的數個受創傷、並經由地方信仰的協助而逐漸復原的個案為研究對象，訪問他們有關地方信仰如何協助他們復原的問題。這幾個個案的訪談結果呈現，在地方信仰教友聚會中，教友聽他們傾訴，陪個案一起唱歌，在地方信仰帶領者的鼓勵下，勇敢的向教友傾訴自己的遭遇，並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教友的肯定，是讓他們復原的力量來源；接受地方信仰協助的個案也認為，經由一些信仰的儀式，例如灑動物的血以去除罪惡 (有關宗教儀式的適用性與倫理問題，將於本文後面篇幅中討論)，不但讓他們的心靈獲得平靜，也因為一些親友陪他們舉行這樣的儀式，讓他們從這樣的關係中獲得復原的力量。Eagle (1998) 認為，這樣的結果其實和西方正統的心理治療的原則是殊途同歸，因為上述的個案的經驗中，可以歸納出地方信仰的做法，是提供個案正向的社會支持以及重新建構對於創傷事件的意義與解釋，這和西方正統的心理治療原則是一致的。DeLaugach (1999) 認為他結合正統

治療方式以及原住民的儀式來處理性侵害的個案，讓治療的層面變得更多，不再只侷限於傳統中的病理（pathological）層面，也讓個案對於事件的意義，有更廣泛的解釋。DeLaugach（1999）認為案主愈能找到廣泛而且多元的解釋，復原情況就會更好。所以 Eagle（1998）和 DeLaugach（1999）認為在創傷的領域中，宗教、地方信仰、與專業治療攜手形成合作關係（collaboration），是提供個案更為全面的（holistic）治療。

前述幾位學者的觀點和研究者在研究背景的段落中所陳述的想法相當一致，意即，宗教或是文化中對於苦難的哲學態度，是可以加入社會工作對於遭受創傷案主的服務當中，宗教所能提供的意義建構與人際支持，是社工員可以將之與社會服務結合之處。Yip（2005）同時也建議，如果能夠從實證研究，探討出合作的方向，是後續值得進行的，也可以讓這個協同合作的模式更具效果。

簡言之，宗教幫助受創傷的人的主要原則在於幫助受創的人們找到希望、在公平正義與不公平正義之間取得平衡，在安全與不安全以及善良與邪惡之間取得平衡

（Drescher & Foy, 1995）；同時也幫助受創傷的人們得到社會支持、重新得到控制感、得到意義、並且能夠建立深層的親密關係（Tedeschi & Calhoun, 1996）。善用宗教對人們正面的影響的作用，善用宗教對人們的可以發揮的激勵、支持、與激發頓悟的效果，是前述學者認為助人專業加入宗教角度的共同的建議。

#### 四、宗教與助人專業的結合方式——協同合作模式的建立

##### 1. 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的結合對創傷的處遇方法

社會工作以及助人專業發展至今，已經開始了解以白種人為中心「孤芳自賞」的方式，以自認為的「科學」的方式來幫助案主，效果並不一定好，尤其西方社會的種族文化複雜且多元，經常在協助這些非英國後裔的民族時遭遇瓶頸。當助人專業在東方世界紮根以後，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因此助人專業者就開始思考與文化結合的問題。西方的文獻已經累積一些研究成果，認為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的結合，對於創傷經驗的處理，是相當有效，也提出具體的結合方式（Geest, 2005; Gingrich & Lightman,

2004; Lightman & Shor, 2002; Waller & Patterson, 2002; Washington & Moxley, 2001)。在助人的過程中加入文化或是宗教的方法的第一種型式，就是在專業的助人過程中加入文化或是宗教的儀式，或者將宗教的信念和社會工作處遇方法加以結合。在專業的處遇過程中，加入案主所習慣或是熟悉的文化或是宗教儀式，例如：禱告，結果顯示是有效的助人或是和案主建立關係的方法；因為這樣的結合不但可以是個人身心安頓的方法，也是人際之間或是團體之間共同建立相互支持、灌注希望的方法（Washington & Moxley, 2001）。Hodge（2006）提到宗教與認知治療結合的處遇方法在社會工作領域當中，已經被廣泛的使用，具體的作法就是在運用案主宗教信仰中的信念來修正導致案主失功能的信念，進而增進案主的良好功能。當然這樣的作法是有其倫理上必須考慮之處，例如：選擇這樣的處遇方法必須是案主同意的。

在助人的過程中加入文化或是宗教的方法的第二種型式，就是在機構中規劃出屬於文化或是宗教的空間，讓助人的會談、諮詢等在這個地方進行。Geest（2005）認為，

在醫院中規劃出一個可以讓病人或是家屬可以進行宗教儀式的地方，並不是要貶低科學的醫療效果，而是讓病人及家屬在可以發展出較好的心靈空間的地方，來了解醫療的角色與計畫，對於疾病的處理或是病人及家屬，都是只有益處沒有壞處的安排。加拿大是一個強調尊重多元文化的國家，協助不同種族是助人專業的挑戰之一，因此加拿大的助人專業就非常重視不同的文化與助人專業結合的議題。加拿大的原住民認為人類遇到問題時，應該回歸到靈性的層面（spirituality）來探索答案，因此他們習慣在遇到問題時，和自己的族人圍成圓圈，共同唱歌祈禱，探討靈性的解答。研究者在加拿大攻讀博士學位的社會工作學院，也在教學大樓中建置一個加拿大原住民文化中的 circle room，讓原住民習慣的圍成圓圈唱歌祈禱的方式，加入助人過程中，使得協助原住民的過程，增強權能（empowerment）更得以實踐。

在助人的過程中加入文化或是宗教的方法的第三種型式，就是和當地的資源人物合作。北美洲有一些保守的地區，例如：加拿大的 Mennonite Community，或者是美國亞歷桑那州的 Navajo Community，

因為社區居民跟外界接觸的機會不多，也比較保守，所以社區中產生非正式協助者（*natural helpers or informal helpers*），非正式協助者會提供當地居民一些生活問題的幫助或是諮詢，如果問題嚴重到超過非正式協助者所能協助的範圍時，非正式協助者也會考慮將發生困擾的居民轉介給外界的專業助人者。由於居民和外界的接觸很少，非正式協助者的居中牽線，可以降低很多居民的擔心與疑慮。而且社工員和當地的非正式協助者合作，也向當地居民展現出尊重當地文化規範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也有助於專業關係的建立，有了非正式協助者的協同合作，專業助人工作者對於當地的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也會有較多的了解。因此專業人員如果和當地社區的非正式協助者合作，或者是和了解這個文化的人（*cultural brokers*）合作對於助人的效果或是助人專業服務進入當地社區，都產生正面的作用（Bogo & Tsang, 1997; Gingrich & Lightman, 2004; Lightman & Shor, 2002; Waller & Patterson, 2002）。研究者所供讀博士學位學校的社會工作學院，除了在教學大樓中設置加拿大原住民的 *circle room* 之外，也有一名 *Aboriginal*

*Elder* 在學系當中，提供學生有關加拿大原住民的文化知識（*cultural knowledge*），事實上也就不是一位扮演 *cultural broker* 角色的人，讓學生在接觸原住民時，能發展出有效的接觸與協助方式。

在助人的過程中加入文化或是宗教的方法的第四種型式，就是方案的合作。宗教信仰中有龐大的人力可以提供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不光只是提供實質上的協助，還可以提供情緒上的支持。因此，Williamson and Hodges（2006）認為為了能夠充份運用宗教所提供的社會支持，社服機構與宗教機構在方案的發展方面可以充份合作，例如：在特殊境遇的婦女的職業技能發展方案上，社福機構可以負責規劃課程內容與提供諮詢服務，而宗教機構則可以提供義工在照顧小孩或是家教方面的協助。

在個案處遇過程之中，宗教也可以和個案工作流程結合。Furman, Zahl, Benson, and Canda（2007）建議，在個案處遇的目標方面，社工員可以將宗教機構納入，擴展案主的資源與支持系統，以滿足案主的需求；在個案預估方面，除了了解個案的宗教信仰及與宗教機構來往的情形之外，預估更應該加入的是



案主對於生命／生活意義的看法；在干預的部分，社工員可以考慮加入一些宗教相關的活動，例如：鼓勵有宗教信仰的個案參加宗教活動，建立支持網絡，也可以和案主討論信仰的某個說法對案主生命的影響。當然這樣的模式並不是適用於所有的案主，Furman, Benson, Grimwood, and Canda (2004) 在另外一個研究中指出，這種直接服務對於經歷失去親人或是患有致命疾病的案主，是最為有效的。

簡言之，適當的將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結合，是深入案主的世界的作法，而能夠進入案主的心靈世界，正是助人專業的核心之一，所以將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結合絕非不好，反而適當的結合是搭起溝通的橋樑的作法。但是我們也必須思考，這樣的結合是否會有負面或是衝突的部分？Lightman and Shor (2002) 就發現，衝突大概都是發生在跟法律相關的問題上，例如要通報家庭暴力、虐待的問題時，社工員和當地非正式協助者的觀點就不同，就會產生矛盾與衝突，但是在創傷復原的過程中，助人專業和宗教／文化合作，是否會有衝突出現，尚未有文獻討論，不過這個議題提醒了研究者未來可以分析之

處。

## 2.文化、宗教與助人專業的結合的爭議

宗教與助人專業結合／協同合作的模式，並非沒有爭議或是缺失，從美國的經驗中可以一窺究竟。西元1996年美國通過的1996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中確定了宗教與社會服務合作的條款(Charitable Choice Provision)(Cnaan & Boddie, 2002)，近年來美國在布希總統(President Bush)的主導之下，於西元2001年1月29日啓動了信仰基礎的社會服務模式(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 initiatives)，具體的作法就是立法讓宗教機構或是採用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機構，可以向聯邦政府爭取經費，同時也鼓勵公私部門基金投入補助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社會服務(Saxon, 2004)。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機構所提供服務的內涵，除了實質的經濟與物品的補助之外，在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內涵中也加入禱告、宗教活動或是儀式，在機構的辦公室中也都明顯的佈置宗教的圖樣(symbols)，但是並不補助宗教

的崇拜儀式 (worships) 或是任何的法會或是佈道大會，也不補助勸說加入宗教 (Tangenberg, 2005)。而這樣的模式的數個爭議之一、值得台灣作為借鏡與思考方向，就是它所提供的服務的效果真的比傳統助人機構所提供的服務還要有效？如果真的比較有效，原因為何？這個問題是一個至今科學研究無法解答的問題，採用研究證實有效的方法是專業助人者應該遵守的倫理之一，因此這種模式令專業工作者卻步 (Hodge, 2006; Saxon, 2004)。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爭議就是在協同合作的模式中，宗教與社會工作專業的比重該如何拿捏？因為比重不光影響對案主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社工員與宗教人員的角色、甚至影響到專業人員聘用的問題 (Cnaan & Boddie, 2002)。除此之外，聯邦政府如此的預算分配，壓縮了一般的社會服務預算，使得社會服務走向私有化 (privatization) 的路途，同時也使得保守思維再度主導社會服務 (Tangenberg, 2005)。

在臨床工作方面，尤其是精神醫學領域之中，宗教信念與精神狀態經常難以區分，在現階段的精神疾病診斷中，宗教狂熱是屬於妄想的一部分，因此使得許多社工員認

為與宗教的結合，是一種精神狀況不穩定的象徵，或者是因為和妄想症狀難以區分，因此乾脆拒絕與宗教的合作 (Gotterer, 2001)。在處理青少年懷孕或是墮胎的議題上，宗教與社會工作也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因而形成倫理上的兩難 (Osmo & Landau, 2003)。除此之外，價值中立是社工專業價值與倫理之一，宗教信念與事實的檢驗，中間難以有一個清楚的界線，使得社工員不敢輕易和案主討論生命意義，僅就具體的問題相互討論。

另外一個廣泛引發爭議的問題，就是這樣的協同合作的模式，是否有社工倫理上的爭議？Canda, Nakashima and Furman (2004) 認為，這樣的協同合作模式在案主自決、無條件關懷、促進社會正義、對抗歧視與壓迫、告知的義務、以專業知識與技能服務案主等部分，都是符合社工倫理的精神與守則。但是現階段的社工教育中對於宗教對人類的影響、或是人類如何將宗教當成是適應的方式、如何區辨精神病理與宗教思考的差別的課程太少，使得這種協同合作的專業程度較受質疑。同時，多數的社工員都同意，必須是在案主和社工員有相同宗教信仰，而且是在案主主動要

求之下，才能和案主一起禱告，然而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可以一起禱告、禱告的主題是否應該明確規範？都是現階段的社工倫理中沒有規定的，這也是此種協同合作模式需要持續努力探討的部分。

## 五、討論

從前述的文獻整理中發現，西方社會工作的起源和宗教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宗教和社會工作的合作是可行。而且在西方多數人有宗教信仰及近年來重視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背景之下，宗教和社會工作的合作模式也能被西方的案主或是社工員所接受。反觀台灣，台灣是否需要或是適合這樣的協同合作模式？台灣的案主能否接受？這樣的模式在台灣運作時，有什麼是必須考慮的？研究者嘗試從：台灣文化中的助人風俗、台灣社工歷史發展中宗教的角色、台灣社工與宗教的結合狀況、以及台灣社工教育的現況等的角度討論起。

以道教以及民間信仰為主的台灣文化中對於遭遇不好的經驗，通常歸因於外在因素，例如：惡靈入侵、犯沖等，一方面顯示的是對於不可知的事件的解釋，一方面可以減低罪惡感（張老師，1980）。盧

世敏（1997）指出，台灣人對於心理的慰藉的部分，傳統上都是尋求民間信仰／民俗醫療的幫助，雖然沒有「治療」的效果，但是的確在人們的心理上產生安定的作用。

「收驚」就是台灣傳統中幫助有情緒困擾的人身心安頓，甚至是調整家人相處模式的方法（張珣，1996），而「抽籤」「擲茭」是面臨難題或是抉擇時，尋找建議或是另外一種想法的方法，向神明訴說則是一種傾訴的作用（張老師，1980）。近年來社會雖然不斷進步與變遷，但是風俗中向宗教求助的風氣並未改變。在佛教的領域中，則有一些箴、訣、佛經的說法，開導人們心念一轉，對事情的看法也就不同；或是引用小故事來開導遭遇困難的人，幫助人們面對生死的問題，或是引述佛陀與弟子的對話，讓聽者悟出道理；也會教導人們唸心經、打坐等方法將煩躁的情緒平靜下來（法鼓山，2006；慈濟基金會，2006；劉秋固，2003）。每年3、4月間媽祖出巡，儼然成為民間文化的盛事，今年（民96年）更有一位公務員父親帶著腦部被病毒感染而癱瘓、醫生也束手無策的女兒前往路中祈福。從這些箴、訣、佛經、小故事、祈福中，幫助

受創傷的人一方面找到遭遇創傷的解釋，一方面也以不同的觀點來平靜心靈，跳脫原來的思考，找到身心安頓的方法。瞿海源（民 88 年）指出，台灣社會解嚴、進入民主時代之後的特色之一，就是宗教的多元化以及宗教影響力的增加，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政治的迫害解除，另外一個原因在於台灣的威權氣氛解除，但是台灣人民仍舊習慣從某些權威人士處獲得答案，使得遭遇人生困境的台灣人，大量加入宗教團體，從宗教團體中獲得支持與安慰。例如：法鼓山就在一些分處成立了身心安頓中心，幫助需要的人，同時也在媒體廣告、官方網站中，宣導不要自殺的理念與從宗教角度自助助人的方法。每當災變發生時，媒體上也不斷出現宗教志工在現場幫忙的身影。這樣的背景使得宗教與協助苦難在台灣有根深蒂固的形象與關係。

台灣光復之後社會工作的起源與發展，與西方的基督教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台灣基督教福利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家扶中心等機構，都在基督教的經費與人員的協助之下，展開福利服務工作（李雲裳，2005；胡婉雯、邱從甯，

2005；蕭琮琦，2005）。多數機構在台灣展開一段時期的服務之後，也都面臨社會工作專業化的任務，因此宗教的色彩都儘量減少，而提供福利服務的人員也從宗教人員逐漸由社會工作學位的畢業生取代。目前社會工作在台灣專業化的形象已經成形，和宗教的關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經不太大。因此，社會工作科系的課程之中，有關宗教與社會工作的結合的課程，研究者發現僅有北部兩所學校的社工系曾開設相關的課程，所以具有社會工作學位的專業社工員，不會在實務工作中加入宗教的角度。再者，社會工作倫理的強調與重視，使得社工員以中立的態度為最主要的原則，助人過程中納入宗教所造成的倫理問題，是現階段無法處理的，也造成社工員的疑慮。同時，在台灣對於助人過程中納入宗教仍舊停留於和神棍、怪力亂神結合的負面印象，使得社工員極力將宗教與專業截然區分開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似乎形成一種現象：台灣的社會文化能夠接受宗教與助人專業的合作，但是社會工作界並未準備好這樣的協同合作關係。

前述西方文獻證明社工與宗教結合的效果是有效的，而且適合走

向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當台灣已經逐漸走入多元文化的環境，社會工作課程與教育也要配合這樣的變遷，提供適合的工作模式。除此之外，從前述的文獻整理與分析之中，可以結論出，文化或是宗教對於創傷經驗提供了解釋、因應方式與社會支持；社會工作與案主宗教結合的協同合作模式，可以提供受創傷經驗的案主對於創傷或是人生苦難的意義建構與社會支持，這個模式所能夠提供的協助，和女性重視關係、在支持與滋養的關係中能夠成長的特質是一致的，因此這樣的模式是一個兼具性別與文化特色的模式。因此，宗教與社會工作結合的協同合作模式，應該是一個因應環境變化的一個模式。但是這樣的模式絕對不是走回台灣早年宗教機構提供救助的模式，也不是強調怪力亂神，而是要發展出新的模式。

但是，什麼是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新模式？而且如何結合才能達成助人效果，而不致於落入宗教偏執的想法當中？如何結合才不致於違反專業倫理？如何結合才能使得社福機構與宗教機構雙贏而不是相互競爭排擠？是這個模式還要努力解決的問題，相關的訓練課程也

必須發展。因此，對現階段的台灣而言，這個協同合作的模式僅能停留在了解世界有這樣的潮流的階段，距離運用尚有一大段距離，也需要更為細緻的研究與規劃，才能變成可以採用的模式之一。

## 六、結論與建議

社會工作與宗教的結合，尤其在創傷的處遇方面，是一個在台灣可以發揮效果的協同合作模式。Bronstein（2003）曾建議，跨領域的協同合作模式要成功建立，專業間必須要互賴、創造出新的專業助人活動、角色要具有彈性且具有平等的權力、認同共同的協助目標、以及在協助過程中不斷的反省與對話。在發展這個模式過程中，根據美國的經驗、前面的討論、以及協同合作模式的精神，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建議中著手：

- 1.需要更多台灣本地的研究，以發展出結合的具體方法。
- 2.社會工作實務界可以開始與宗教界有更多、不斷的對話，發展出具體的合作目標與方法，例如：可以在協助的方法、方向與觀念、角色、困難等方面一一比較。
- 3.社會工作一旦和宗教合作，必須是平等與互賴的合作關係，需

要發展出清楚的專業界線，以及專業衝突的解決方法。

4.和宗教的結合，不是與宗教的神秘儀式結合，也不是勸說入教，而是與宗教的社會支持網絡、對於生命議題意義探索的結合。

5.承續前一項的建議，社工員目前對於這種協同合作模式所抱持的態度應該是：這種協同合作的模式現階段的研究指出僅適用於受創傷經驗、失去親人、面對致命疾病的案主，而且也是處遇這類型個案的選項之一，並不能取代目前已經運用許久的社會服務模式，也不是可以適用於任何問題的案主。

6.全球社會工作教育與訓練的標準中闡明宗教是人類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以全方位（holistic）的模式來了解人類發展的角度之一（Furman, 2007）。因此在著重多元文化社工教育的模式中，是應該加入宗教與社工合作的模式。然而在教授相關課程時，必需尊重不同的宗教，也必需尊重修課學生的宗教信仰信念，避免因為這樣的結合模式的課程，所可能帶來的歧視與偏見。

7.雖然 Furman et al. (2007) 的研究結果顯示，將宗教納入社會工作實務當中的社工員，80%以上都認為這樣的模式的使命，是符合社會工作倫理要求。但是如同 Hodge (2006) 以及 Saxon (2004) 所言，這個協同合作的模式尚有許多部分是我們需要一一討論與檢視的，這個模式是否有社工實務過程倫理上的特殊考量？例如：當案主並未提起任何宗教有關想法時，社工員可以主動討論嗎？都是後續值得討論的主題。

## 結 論

在多元文化的今天，社會工作服務模式能夠適時的回應這樣的變遷是必要的。西方處理創傷經驗案主的模式與爭議，提供了台灣一個借鏡，然而什麼是適合台灣的協同合作模式，仍然需要社會工作界累積較多的研究與經驗中，逐漸發展。

（本文作者劉珠利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註 釋

註 1：Spirituality 和宗教（religion）是否是一個同義詞？不同研究者有不同

的看法。但是因為所謂「宇宙間看不見的巨大能量」的定義過於玄虛，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選擇 Shaw, Joseph, and Linley (2005) 的看法，也就是 spirituality 和文化以及宗教是同義詞，因為兩者都是一套信念、價值，協助人們尋找人和環境、事件、以及宇宙間的關係，尋找生命的意義。

註 2：Shaw et al. (2005) 指出，宗教和 spirituality 同樣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許多文獻中都混合使用，研究者在整理探討文獻時，也同樣發現在文獻中，文化、宗教、spirituality 是許多作者探討時，都會共同出現與使用的名詞。因此在以下的文獻中，研究者也將 3 個名詞放在一起討論。

## 📖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2005) Retrieved on Dec. 5, 2006 from [http://www.dgbas.gov.tw/p.asp?CtNode=3120&CtUnit=1049&BaseDSD=34&xq\\_xCat=07](http://www.dgbas.gov.tw/p.asp?CtNode=3120&CtUnit=1049&BaseDSD=34&xq_xCat=07)
- 王維芳 (2000) 「創傷後反應」之概念分析，榮總護理，17 (2)，111～118。
- 王增勇 (2005) 原漢通婚家庭暴力婦女的復元經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未出版)。
-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06) 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簡介，Retrieved on Dec. 4, 2006, from [http://www.b0sa.tcg.gov.tw/i/i0300.asp?fix\\_code=1208005&group\\_type=2&11\\_code=12&12...](http://www.b0sa.tcg.gov.tw/i/i0300.asp?fix_code=1208005&group_type=2&11_code=12&12...)
- 李雲裳 (2005) 台灣早期社會福利工作回顧台灣基督教福利會 1964～1974 年工作紀實，社區發展季刊 (109)，245～255。
- 法鼓山 (2006) 過來人的見證，Retrieved on Dec. 13, 2006 from <http://www.no-suicide-no.com/top05.asp>
- 吳麗琴 (2002) 性侵害受害者之復原力探討與建構，輔導季刊，39 (1)，57～63。
- 沈勝昂 (2001) 犯罪被害創傷壓力模式與身心復健，警學叢刊，3 (6)，83～106。
- 林耀盛 (2001) 時間與意義——疾病、創傷及敘說之交疊構面，本土心理學研究，15，221～270。
- 林耀盛、陳淑惠、洪福建、曾旭民 (2005) 差異的聲音：不同性別震災受創

- 者心理社會反應之比較分析，臨床心理學刊，2（1），31~40。
- 范國勇（2000）強姦犯罪問題與被害人創傷症之探討，警學叢刊，13（3），69~95。
- 胡婉雯、邱從甯（2005）台灣世界展望會發展歷史，社區發展季刊（109），310~316。
- 陳宇嘉、王琇蘭（2001）震災後兒童與少年的創傷處置，研考雙月刊，25（1），89~96。
- 陳淑惠、林耀盛、洪福建、曾旭民（2000）921 震災受創者社會心理反應之分析——兼論「變」與「不變」間的心理社會文化意涵，社會文化學報，10，35~60。
- 黃慧菁、劉雪娥（2000）一位 921 震災截肢婦女的創傷後反應及其護理經驗，長庚護理，11（4），79~85。
- 盧世敏（1997）從身心症談到民俗醫療，弘光醫專學報，29，357~363。
- 蕭琮琦（2005）為愛兒童而生，要陪兒童而行——台灣家扶基金會兒童福利服務發展史，社區發展季刊（109），317~329。
- 蘇秀娟、李慧貞、林建志（2000）921 地震北縣新莊災民創傷後反應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護理研究，8（6），652~662。
- 李俊源（2000）復原力對諮商的啟示，輔導季刊，36（3），32~36。
- 吳麗琴（2003）性侵害受害者之復原力探討與建構，輔導季刊，39（1），57~63。
- 洪福源（2005）強化個人生活的力量與自信——復原力的觀點，輔導季刊，41（2），37~45。
- 高淑貞、邱英南（2002）921 地震災區學童心理復健工作模式——以集集地區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5（3），1~30。
- 張老師月刊（1980）民俗心理輔導，張老師月刊，6（6），12~38。
- 張世澤（2005）台灣天主教傳教協進會中女性地位之研究：新竹市的個案分析，女學學誌（19）。
- 張珣（1996）民俗醫療與文化症候群，歷史月刊，1月號，50~54。
- 曾文志（2005）大一學生歷創傷事件與復原力模式之文獻分析研究，慈濟通識教育學刊（2），117~162。
- 葉美玉（2002）創傷後壓力疾患與團體心理治療，長庚科技學刊（1），243~250。
- 慈濟基金會（2006）把希望放在當下，Retrieved on Dec.13, 2006, from



<http://www.tzuchi.net/Mind/Map.nsf/d7296faaf163d19d4825e8d000bd1b1/94036fb7b3890...>

- 廖秀敏（2002）性侵害個案復原力技巧之運用，諮商與輔導，203，22～24。
- 蔡素妙（2003）復原力在受創家庭諮商復健工作中的應用，輔導季刊，39（2），42～49。
- 蔡素妙（2004）地震受創家庭復原力之研究——以 921 為例，中華人文社會學報（1），122～145。
- 謝儒賢（2002）發展兒童性侵害社會工作處遇模式之初探，朝陽人文社會學刊，1（1），71～100。
- 劉秋固（2003）悲傷輔導——從「佛說無常經」中了悟「化煩惱為菩提」之原理以協助 921 災後心靈重建，研究與動態（9），157～165。
- 劉珠利（2006）台灣天然災害受災女性經驗之探討成果報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4-2412-H-029-013），未出版。
- 瞿海源（1999）解嚴，宗教自由，宗教發展，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Taiwan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aipei, Taiwan.
- Alcock, M. (2003) Refugee Trauma—the Assault on Meaning. *Psychodynamic Practice*, 9.3, 291-306.
- Arrington, E. G., & Wilson, M. N. (2000) A Re-examination of Risk and Resilience During Adolescence: Incorporating Culture and Diversity.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9(2), 221-230.
- Bartelt, d. (1994) On resilience: Questions of validity. In M.C. Wang & E. W. Gordon (Eds.), *Educational resilience in inner-city Americ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97-108.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elenky, M. F., Clinchy, B. M., Goldberger, N. R., & Tarule, J. M. (1986/1997)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go, M., & Tsang, A. K. (1997) Engaging with clients cross-culturally: towards developing research-based practic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6(3-4), 73-91.
- Bolin, R., Jackson, M., & Crist, A. (1998) Gender Inequality,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 Enarson & B. H. Morrow (Eds.)

-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Chapter 2. P.27-44.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Bradley, R., Schwartz, A. C., Kaslow, N. J. (200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uicidal behaviors: Self-esteem, social support, and religious coping.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6), 685-696.
- Bronstein, L. R. (2003) A mod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ocial Work*, 48(3), 297-306.
- Butts, J. D. (2001) Spirituality & Sexuality: A Program for Women in Recovery.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Special Issues: "The Health of Women of Color"*, 17(2), 102-106.
- Canda, E. R. (2002) A world wide view on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work: reflections from the USA experi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Currents*, 1(1), 1-6.
- Canda, E. R., Nakashima, M., & Furman, L. D. (2004)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bout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insights from a national qualitative survey. *Families in Society*, 85(1), 27-35.
- Cnaan, R. A. & Boddie, S. C. (2002) Charitable Choice and Faith-Based Welfare: A call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47(3), 224-235.
- Connor, K. M., Davidson, J. R. T., & Lee, Li-Ching (2003) Spirituality, Resilience, and Anger in Survivors of Violent Trauma: A Community Surve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5), 487-494.
- Corcoran, J., Mewse, a., & Babiker, G. (2006) The role of women's self-injury support groups: a grounde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forthcoming).
- DeLugach, S. P. (1999) Indigenous Models of Healing and Sexuality: Restoring Sexual Balance. *Sexual Addiction & Compulsivity*, 6, 137-150.
- Drescher, K. D., & Foy, D. W. (1995) Spirituality and trauma treatment: Suggestions for including spirituality as a coping resource. *National Center for PTSD Clinical Quarterly*, 5(1), 4-5.
- Eagle, G. T. (1998) Promoting Peace by Integrating Western and Indigenous Healing in Treating Trauma.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4(3), 271-282.

- Faver, C. A. (2004) Relational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Caregiving. *Social Work*, 49(2), 241-249.
- Fearday, F. L., & Cape, A. L. (2004) A Voice for Traumatized Women: Inclusion and Mutual Support.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27(3), 258-265.
- Figley, C. R. (1989) *Helping Traumatized Famili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Frazier, P. A. (2000) The Role of Attributions and Perceived control in Recovery from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 5, 203-225.
- Furman, L. D., Benson, P. W., Grimwood, C., & Canda, E. (2004)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direct prac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Survey of UK social work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4, 767-792.
- Furman, L. d., Zahl, Mari-Anne, Benson, P. W., & Canda, E. R. (2007)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Families in Society*, 88(2), 241-254.
- Garmezzy, N. (1993) Children in poverty: resilience despite risk. *Psychiatry*, 56, 127-136.
- Geest, S. van der (2005) "Sacraments" in the Hospital: Exploring the Magic and Religion of Recovery. *Anthropology & Medicine*, 12(2), 135-150.
- Giesbrecht, N., & Sevcik, I. (2000) The Process of Recovery and Rebuilding among Abused Women in the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Subcultur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5(3), 229-248.
- Gingrich, L. G., & Lightman, E. (2004) Mediating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A Case Study of Informal Helpers in an Old Order Mennonite Community. *Families in Society*, 85(4), 511-520.
- Gotterer, R. (2001)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n clinical social work practice: a client perspective. *Families in society*, 82(2), 187-193.
- Green, B. L. (2000) traumatic Loss: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Links between Trauma and Bereav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 5, 1-17.
- Haight, W. L. (1998) "Gathering the Spirit" at First Baptist Church: Spirituality as a Protective Factor in the Lives of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Social Work*, 42(3), 213-221.
- Harvey, M. R. (1996) An ecological view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trauma recover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1), 3-23.
- Hesse, A. R. (2003) *Secondary Trauma: How Working with Trauma Survivors*

- Affects Therapists.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0(3), 293-309.
- Hill, R. (1997) *Strengths of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Twenty-five Years later*. Washington, DC: R & B Publishers.
- Hodge, D. R. (2006) Spiritually modified cognitive therap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ocial Work*, 51(2), 157-166.
- Holleran, L. K., & Waller, M. A. (2003) Sources of Resilience Among Chicano/A Youth: Forging Identities in the Borderlands.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0(5), 335-350.
- Hope, R. M., & Hodge, D. M. (2006) Factors Affecting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the Death of a Parent: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Viewpoint.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23(1), 107-126.
- Jordan, J. V. (1992) *Relational Resilience*. Wellesley, MA: Stone Center Publications.
- Joseph, s., Linley, P. A., & Harris, G. J. (2005) Understanding Positive Change following Trauma and Adversity: Structural Clarification.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0, 83-95.
- Kennedy, J. E., Davis, R. C., & Taylor, B. G. (2000) Changes in Spirituality and Well-Being among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22-328.
- Kessler, R. C., Sonnega, A., Bromet, E., Hughes, M., & Nelson, C. B. (199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2, 1048-1060.
- Lebowitz, L., & Roth, S. (2006) "I felt like a slut":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women's response to being raped.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3), 363-390.
- Lewis, R. E., Fraser, M. W., & Pecora, P. J. (1988) Religiosity Among Indochinese Refugees in Utah.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7(2), 272-283.
- Liem, J. H., O'Toole, J. G., & James, J. B. (2006) Themes of power and betrayal in sexual abuse survivors' characteriza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4), 745-761.
- Lightman, E. & Shor, R. (2002) Askanim: Informal Helpers and Cultural Brokers as a Bridge to Secular Helpers for the Ultra-Orthodox Jewish Communities of Israel and Canada. *Families in Society*, 83(3), 315-324.

- Mahoney, M. J., & Graci, G. M. (1999) The Meanings and Correlates of Spirituality: Suggestions from An Exploratory Survey of Experts. *Death Studies*, 23, 521-528.
- Manning, M. C., Cornelius, L. J., & Okundaye, J. N. (2004) Empowering African Americans Through Social Work Practice: Integrating an Afrocentric Perspective, Ego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Families in Society*, 85(2), 229-235.
- Mattis, J. S. (2002)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meaning-making and coping experiences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 qualitative analysi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6, 309-321.
- Medical Dictionary of MedicineNet (2006) Definition of Trauma. Retrieved on Dec.4, 2006, from <http://www.medterms.com/script/main/art.asp?articlekey=817&pf=3&page=1>
- Mills, R. C. (1995) *Realizing Mental Health*. New York: Salzberger & Graham.
- Miller, D. B., & MacIntosh, R. (1999) Promoting resilience in urban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Racial socialization and identity as protective factors.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59-170.
- Miller, J. B. (1986)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Mishna, F., Antle, B. J., & Regehr, C. (2002) Social Work with Clients Contemplating Suicid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in the clinical, 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0(3), 265-280.
- Nan Van Den Bergh (1998) *Feminist Practice in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1995)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Publication No. 95-3879.
- Neil, C. M., & Kahn, A. S. (1999) The role of personal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us social activity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older widowed women. *Sex Roles*, 40(3/4), 319-329.
- Norris, F. H., Perilla, J. L., Ibanes, G. E., & Murphy, A. D. (2005) Sex differences in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oes culture play a rol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4(1), 7-28.
- Norman, J. & Wheeler, B. (1996) Gender-Sensi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A Model for Edu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Spring/Summer, 32(2),

- 203-213.
- Osmo, R., & Landau, R. (2003) Religious and secular belief systems in social work: a survey of Israeli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Families in Society*, 84(3), 359-366.
- Pearlman, L. A., & Courtois, c. A. (2005)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attachment framework: Relational treatment of complex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5), 449-459.
- Raveis, V. H., Siegel, K., & Karus, D. (1999)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a par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8(2), 130-136.
- Regehr, C. (2005) Bringing the Trauma Home: Spouses of Paramedic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0, 97-114.
- Regehr, C., & Bober, T. (2005) *In the Line of Fire. Trauma in the Emergency Serv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gehr, C., Marziali, E., & Jansen, K. (1999)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Sexually Assaulted Women.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27(2), 171-184.
- Saari, C. (2005) The Contribution of Relational Theory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75(3), 3-14.
- Saxon, J. L. (2004) 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s. *Popular Government*, fall, 4-15.
- Schiele, J. H. (1996) Afrocentricit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41(3), 284-294.
- Shaw, A., Joseph, S., & Linley, P. A. (2005) Religion, spiritualit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 systematic review.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8(1), 1-11.
- Smith, M. E., & Kelly, L. M. (2001) The Journey of Recovery after a Rape Experience.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2, 337-352.
- Specht, J. A., King, G. A., Willoughby, C., Brown, E. G., & Smith, L. (2005) Spirituality: A coping mechanism in the lives of adults with Congenital Disabilities. *Counseling and Values*, 50(October), 51-62.
- Stamm, B. H., Stamm IV, H. E., Hudnall, A., & Higson-Smith C. (2004) Considering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and Los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9(1), 89-111.

- Stoppelbein, L., & Greening, L. (2000)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in parentally bereav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9(9), 1112-1119.
- Tangenberg, K. M. (2005) Faith-based human services initiatives: consider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theory. *Social Work*, 50(3), 197-206.
- Taylor, A. J. W. (2003)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appraisal of disaster trauma in thre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44(2), 177-193.
- Taylor, A. J. W. (1999) Value conflict Arising from a Disaste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Disaster and Trauma Studies*, 2, 1-9.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455-472.
- Turner, S. G. (2001) Resilience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Three Cases Studies.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82(5), 441-448.
- Waite (2000) How is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Gendered?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he Collectives of Suleimaniyah, Iraqi Kurdistan. *Disaster*, 24(2), 153-172.
- Waller, M. A., & Patterson, S. (2002) Natural Helping and Resilience in a Dine(Navajo) Community. *Families in society*, 83(1), 73-84.
- Walsh, F. (2003) Crisis, Trauma, and Challenge: A Relational Resilience Approach for Healing,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74(1), 49-71.
- Washington, O. G. M., & Moxley, D. P. (2001) The Use of Prayer in Group Work with African American Women Recovering from Chemical Dependency. *Families in Society*, 82(1), 49-59.
- Weaver, A. J., Flannlly, L. T., Garbarino, J., Figley, C.R., & Flannelly, K. (2003)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0-1999*.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6(3), 215-228.
- Werner-Wilson, R. J., Zimmerman, T. S., & Whalen, D. (2000) Resilient Response to Battering.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22(2), 161-188.
- Williamson, S. A., & Hodges, V. G. (2006) It kind of made me feel important: client reflections on 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Religion &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25(2), 43-57.

- Winfield, L. F. (1994) Developing resilience in urban youth. NCREL Monograph. Oak Park, IL: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Available: <http://www.ncrel.org/sdrs/areas/>
- Worden, W. J. (1996) Children and grief: When a parent dies.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 Yip, Kam-shing (2002) Transcendence from Trauma and Terrorism: A Taoistic Reflection. *Families in Society*, 83(4), 403-404.
- Yip, Kam-shing (2005) Taoistic 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Chinese Communities. *Families in Society*, 86(1), 35-45.
- Zlotnick, c., Shea, T. M., Rosn, S., Mulrenin, K., Begin, A., & Pearlstein, T. (2006) An affect-management group for women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historie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0(3), 425-436.